

明确“三性”大力发展县级博物馆事业

清江县博物馆 李玉林

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指出：博物馆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博物馆的“三性”是社会主义各类、各级博物馆的“共性”。清江县博物馆建馆二十二年的实践过程也是我们对博物馆的“三性”逐步认识、渐次明确的过程，并根据不同时期，对收藏、陈列、科研三者，各有侧重，又互为促进，从而使清江县博物馆事业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一）

清江县博物馆事业之所以发展较快，首先是抓了“收藏”，特别是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考古调查，配合科学发掘，出土了一批文物和收集了一批流散文物，从而为建馆提供了物质基础。进行考古调查和征集文物，是一个地志性县级博物馆责无旁贷的职责。众所周知，“清江县博物馆是靠遗址起家的”。早在五十年代饶惠元先生和省博物馆专业人员，就在清江调查发现了几十处古文化遗址并采集了大量标本。195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省博物馆又对营盘里古文化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揭开了江西对古文化遗址科学发掘的序幕，从而为1962年建立清江县博物馆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六十年代，省博物馆又在清江发掘了一批古墓葬，丰富了文物藏品，到七十年代，我馆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要是配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调查发现了吴城商代遗址。在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所黄景略、马得志等专

家指导下，我馆配合江西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对吴城商代遗址和筑卫城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尔后又配合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省博物馆对吴城、筑卫城、樊城堆等古文化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丰富了藏品。有了物，促进了馆房建设，文物仓库和文物标本修复、整理工作场地也必须相应建设。因此，一个地志性县级博物馆（不包括专业馆）应当承担起文物考古调查和配合科学发掘的职责。

（二）

科学研究是博物馆各项工作的基础，也是加强博物馆学理论建设，发挥文物标本作用，提高陈列展览水平，增进宣传教育效果和藏品的科学管理等方面的“关键”问题。一所博物馆的藏品再多，如果不实行科学管理，不对文物进行科学研究，也会变成一堆废品，有了对藏品的科研成果，如果没有对陈列学的科学研究，没有直观、形象、生动活泼和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皆具的陈列展览，就不能吸引观众，就不能完成传播历史、科学、文化知识，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任务，达不到“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和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之目的。

清江县博物馆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对博物学理论研究至为重要。社会上部分人员，甚至有的领导，不承认博物馆是“科研机构”，甚至觉得在文化宣传机构

中，这也是“清闲”、“养老”单位。即使是本馆人员，对“三性”的学习、认识、实践也是不够的。所以我馆的机构设置，一直在探讨过程中。根据我们实践，设置三组、三室、一房、一库，即文物考古组、陈列资料组、群众办事组和图书资料室、文物标本室、文物修复室以及暗房、文物仓库。这是根据一个县级博物馆馆小，人少，各项业务“肝胆齐全”而设置的，也是根据博物馆“三性”这一共性和县级博物馆的特殊性在机构建设方面的初步实践和探讨。当然，更重要的是对博物馆学理论的探讨。

还须加强对藏品和史料的研究工作。一九八二年，我馆筹办《清江县简史陈列》，试图以文物为基础，“史物结合”，通过“实物与版面相结合”的方式，较系统地编写一部“实物”史料的《清江简史》。这个陈列自一九八二年正式开放以来，接待了广大观众，包括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的领导同志和省内外领导和专家，他们对这个陈列给予充分肯定，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大部份同志认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这两部分科学性、知识性、连贯性较强，突出了地方特色，但封建社会部分则显得单薄，有“头重足轻之感”。这些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研工作的重要性。陈列中，原始、奴隶社会部分，由于所陈列的古文化遗址、遗迹、遗物是经过科学发掘，特别是对吴城商代遗址的科研工作比较深入，我们将已经取得一致看法的学术观点，和对遗物研究的科学论述，反映到陈列中，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封建社会部分，按陈列的文物数量比前两部分多，而观众却有“单薄”之感；按历史上的清江自五代南唐建立清江县到宋、元、明时期，又是一个新的大发展。但观众却有“头重足轻”之感，其“关键”就是这一时期的科研工作没有跟上，所以即使有较

多的实物，也不能很好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状况。

(三)

博物馆是宣传教育机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它不是“古董铺”，也不是仅供少数人欣赏“古玩”的场所，而是面向社会，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阵地。胡乔木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博物馆事业是重要的教育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阵地，是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投资。清江县博物馆的经验证明：博物馆一是要有物，二是要有宣传阵地，其教育手段，就是运用文物，举办陈列展览，面向社会，特别是面向农村，配合学校教育，向广大青少年进行“乡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自恢复博物馆机构，近十余年来，我们主要举办了以下三种类型的陈列展览：

一是在发掘工地，将出土文物举办小型展览，向广大农民进行宣传教育。我们在吴城商代遗址、筑卫城新石器时代遗址科学发掘后，都举办了这类小型展览，特别是吴城商代遗址发掘工地的展览，参观人数多，宣传面广，来自全县各生产队参加兴修水库的几万民工，都先后参观了展览，接受了一次很好的“乡土教育”。

二是建立宣传教育阵地，举办经常性展览和基本陈列，除本县观众外，我们每年都要接待来自各省、市参加“全国药材交流会”的数千名代表和过往旅客。作为一个县级博物馆，我们特别重视“配合学校教育”，几年来，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师生结合教学，有组织地专程参观我馆基本陈列和古文化遗址，许多学校结合历史教学，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参观，进行直观教学，樟树中学高一年级在语文教学中，结合《新疆访古》课文，特地组织全年级六个班的学生，参观了我馆举办的《清江历史文物陈列》，

农村和外地的中、小学春秋季节旅行，也把参观博物馆作为主要内容之一。为了检验宣传效果，活跃春节文化娱乐活动，在一九八四年春节，我们还举办了一次《清江历史文物一般知识有奖测验》。这次有奖测验为我们陈列内容设计和陈列形式设计工作者，如何进一步提高陈列质量，提出了研究探讨的课题，即如何使广大观众参观陈列展览后，真正能受到教育。

三是举办临时性和专题性的展览。几年来我们举办了《红军长征图片展》、《周恩来同志为共产主义光辉战斗的一生图片展览》、《落后者就要挨打图片展览》、《明清字画展》、《清江美术、摄影、书法展览》等。特别是1978年，江南地区印纹陶学术讨论会在庐山召开，会议代表专程来到清江参观时，我们除在《清江出土文物展览》展出了吴城、筑卫城等地出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物外，还将没有发表的樊城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出土遗物按地层分类对比展出，给考古专业工作提供了研究的实物标本。在一九八二年全县大规模文物普查外业工作结束后，我们又举办了《清江县文物普查成果

展览》，将调查的100余处古文化遗存所采集的标本和收集的流散文物全部展出。我馆在全省文物普查期间，先后接待了五十余个县市文物普查工作人员，彼此交换了普查中的经验，许多初次搞普查工作的同志通过参观我县普查中的实物标本，为识别古文化遗物找到了实物教材。宜春地区文物普查骨干训练班，是在我县举办的；吉安地区文物普查骨干训练班，也乘专车到我县参观学习两天。由于大部分同志都是初次接触该项工作，通过参观我馆各代器物，又参观普查中所采集的标本，深受启发，有的同志说：“犹如进大学上了一堂生动的实物教学课。”

以上是我们学习、实践博物馆“三性”的粗浅体会，也是对县级博物馆性质和职能的初步探讨。除上述文物考古调查，配合科学发掘，收藏、陈列、科研之外，还有地面文物的保护，为社会各方人士提供咨询材料等工作。胡乔木同志曾指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缺少一系列用来教育人民的从历史到现实的各种类型的博物馆。”我们必须明确博物馆的“三性”，大力发展县级博物馆事业，充分发挥博物馆对人民群众的教育作用。

（上接第56页）

第1期 1960年。

①⑨裴文中《柳城巨猿洞的发掘和广西其它山洞的探查》1965年 页29—30, 32—33。

②⑩顾玉根《广东灵山洞穴调查报告》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6卷第2期

③⑪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的旧石器》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2卷第1期。

④⑫R. Maglieni,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in Eastern Kwangtung,
1975, PP. 30—36.

⑤⑬Kwang-Chih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1979.
P. 85—91.

⑥⑭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⑦⑮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南海西樵山出土

石器》《考古学报》1959年 第4期。

⑧⑯中山大学调查小组《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石器的初步调查》《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地理专辑）1959年第1期。

⑨⑰周国兴、易光远《中国第一座洞穴科学博物馆——白莲洞遗址的重要发现》1983年未刊稿。

⑩⑱张森水《我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若干问题》《人类学学报》第2卷第3期。

⑪⑲复鼎《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⑫⑳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

⑬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⑭㉒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1979年。